

CHINA

“日本” 刀双上 的文化

RIBENDAORENSHANG

—— 武士与武士道

姜贵书 著



DEWENHUA

贵州人民出版社

CHINA



**RIBENDAORENSHANG
DEWENHUA**

CHINA

2002
K313.03
33
2

“日本” 刀刃上的文化

—— 武士与武士道

娄贵书 著



3 0690 5390 2

贵州人民出版社

序

姜贵书副教授的《日本：刀刃上的文化——武士与武士道》一书，同读者见面了。

她凝聚着作者 20 多年来的心血、汗水和期待。

学术领域中任何一部成功的著作，都有她本身鲜明的特色和无穷的魅力。或因其视野开阔，体系新颖；或因其独具创见和匠心，资料翔实；或因其文字生动活泼，表述明晰，而为同行关注，为广大读者青睐。

日本的武士产生于班田制度弛的 8~9 世纪，各地庄园主为了镇压人民起义，巩固封建统治，保护庄园，扩充势力，往往通过庄司组织武装家兵，由主人供应给养、装备，服从主君并受主君的庇护，此即日本历史上“武士”的起源。武士与主人结成封建的主从关系，武士在日常和战时对首领效忠。武士团的首领有一些是地方庄园主或郡司士绅；有一些则是中央政权失势后流落地方的贵族及其子弟。日本的武士是在封建制逐渐确立的过程中形成的军事贵族的底层。10 世纪时，日本最大的武士团是出身于宗室贵族的关东源氏和关西平氏两大集团。经过反复、激烈的战争后，源氏胜利，1192 年建立镰仓幕府，夺取了与天皇朝廷平行并掌握实权的中央政权。

从镰仓时代、室町时代直到德川幕府(1192~1867年止),日本历史上有着长达近700年“以武为本”的幕府统治时期。这是日本有别于任何国家的历史特点。自明治维新迄今130多年的历史中,日本社会以“武士道”作为文化和社会伦理的支柱之一,长期对日本的精神文明和民族性格有着浸润和影响。

关于日本历史上的武士和武士道问题,日本、美国和中国学者都有一些研究成果。其代表性著述计有:日本井上哲次郎著《武士道的本质》(八光社1942年版);藤直干著《日本的武士道》(创元社1956年版);镰田茂雄:《禅与日本武士道》(载《中日佛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新渡户稻造著《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森岛通夫著《透视日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美国的本尼迪克特著《菊花与刀》(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赖肖尔著《当今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台湾学者林景渊:《武士道与日本传统精神》(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3年);万峰:《评台湾学者的日本武士道观》(《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王家骅著《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上述著作对日本武士和武士道的研究,均有可喜的成果和进展,大体上属于传统性的评析。主要表现为:1. 围绕日本的封建等级制度展开探讨,重点是武士同主君之间的“报恩”和“义务”;2. 以土地资源和经济、政治权力的争夺为主导,结合社会结构的剖析,说明武士和武士道是尚武社会的产物和需要;3. 从儒教、佛教和日本神道教的综合影响,分析武士的思想习性和

崇武献身精神等等。

姜贵书新著的本书共分八章，第一、二章的内容是：环境与民族、历史与社会，扼要阐述武士与武士道的载体和形成的背景。第三、四、五章着重阐明武士、武家政治与武士道的来源、阶级实质、要害和特点。第六、七章追溯武士道的渊源与“德目”，分析了武士道是怎样吸收、融合与利用儒、佛和神道教的，并说明武士道的主旨是忠诚、武勇和服从。最后的第八章联系并分析了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及日本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通过浏览姜著新书，我发现姜的新著不仅借鉴吸取了此前相关研究的众多成果，而且同其他著述有明显的不同之处。本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特向读者略作推荐。

第一，著者从新视角和新思路出发，以精神文明和意识形态为主线，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武士与武士道。

在本书中，1. 着重发掘了日本人独特的尚武精神从何而来；2. 著者认定日本的武士道是最核心、最底层的文化之一，是研究日本文化的基础；3. 强调日本国内长期以来军国主义流毒之深，同武士和武士道的影响密不可分；4. 武士道已积淀为日本人道德、伦理规范和民族心理中的重要内容。

第二，本书采用了以历史顺序为经、以专题论析为纬的纵横结合、史论交织的新框架。

本书的重点是日本古代中世纪时武士与武士道的来龙去脉，揭示出武士对主君的依赖关系，以及武士同战争密不可分的条件，崇尚武勇的性格特征和献身精神。著者深刻地指出：长期的幕府以武为本的体制，是武士与武士道精神得

以扩大和延续的基础。本书重视联系明治以后迄今日本的历史和现实,这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本书采用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新方法。

新著一方面运用经济学、社会学的知识,指出武士的产生是日本平安时代争夺封建领地和政治权力斗争的需要,武士和武士道是“以武为本”的社会的产物。从经济人、社会人的角度看,武士与主君实质上是以利害关系为纽带,武士依赖主君生存;主君依靠武士效命,面对面的互动。幕府体制维系和巩固了武士阶层的长期存在和不断扩大。

新著另一方面又运用了伦理学、道德学和民族学的知识,指出武士道具有独特的伦理文化性质,武士对主君献身、对战争的使命感,便是武士道的道德规范。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经过千余年历史进程的积淀,业已溶入日本民族传统的一部分。

第四,本书以历史为据,深刻剖析并揭露了日本武士道的双重标准和两面性。

在日本历史上,武士道曾调节了封建时代历届幕府武力社会中人我己群的利害关系。武士道的标准、观念和精神,具有超契约、超法律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武士道文化值得研讨。

著者在本书中特别着重总结出武士和武士道具有内外不一的双重标准和相对性道德。

封建时代,在武士团内部和各个武士团之间,武士道的标准和适用的内容,迥然有别。武士团内部强调对主君的诚信,恪守职责,和谐统一。但武士们均归附本利益共同体,并

无广泛的社会意识。在各武士团之间或对其他群体和民族，则奉行尚武的、弱肉强食的准则，充当战争工具，以武勇、野蛮、掠夺和杀人为荣。这是本书特别精辟的论点。

第五，著者在新著的最后部分联系了明治维新以来的基本史实，指出武士和武士道是日本独有的双刃剑文化。

著者指出，武士道中提倡的献身精神和责任感、使命意识，在日本的民族文化中曾不同程度地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民族底蕴，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必须强调的是，近现代以来，武士道表现为对日本天皇的愚忠，成为对外侵略战争的灵魂，乃是军国主义的温床。二战后，日本一系列“民主化”改革，虽然摧毁了有形的武士道，但对其流毒不可忽视。武士道的残余，使一些日本人迄今对于历史上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滔天罪行仍然缺乏负罪感，这是世人尽知、不容诡辩的。

总之，姜贵书同志的新著，是一部视角思路新、有真知灼见，鲜有人论及且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专著。许多论点会引起读者的兴趣，也必然会启发思考和讨论。当然，由于此题难度大，资料阙如，在国内尚无直接的学术前史，也无类同的研究成果，难免有不足之处，如第一手史料尚嫌不足，某些提法的论据有待充实，若能将日本武士同西欧骑士加以比较，会更圆满些。

爰赘短文，是为序。

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理事长、教授 刘明翰

2001年11月30日于北京

CHINA

研究课题

《日本：刀刃上的文化——武士与武士道》

日本是既让人钦佩，又令人憎恨的国家。一方面是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度、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国民在现代化经济建设中的献身精神、使命感、责任感和恪守职责、吃苦耐劳；另一方面是穷兵黩武、嗜杀成性的军国主义，国民对军国主义战争政策惊人的认同与合作态度，愚忠、盲从地成为一种巨大的破坏性力量。

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既是凭借中国先进文化的哺育迅速成长的国家，又是百余年来对中国加害最深、给中国造成损失最大的国家。2001年，日本政府还通过了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的历史教科书，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日本也是现代化建设步伐最快的国家，仅用短短一个多世纪，就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由中国的学生转变成为中国的先生。

因此，无论是有效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度复活，还是学习日本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当今世界，中国最需要深入了解、剖析的国家，都是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

独立不群的日本 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与思想习性非常独特，既与欧美人截然不同，又与中国人迥然有别，尽管日本是依靠中国文化哺育成长起来的国家。

美国学者说：“日本人是美国曾竭尽全力与之战斗过的最异特的外敌。我们在其他任何一次与强敌的战争中都未曾需要顾及如此截

然不同的行为与思想习性。……已被西方人视作人类习性的那些战争规范对日本人来说显然是不存在的。”“日本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当我对某种行为感到迷惑不解时，我就愈加认为在日本人生活的某个方面存在着导致这种怪异现象的制约因素。”^①“日本人对事物及思想的理解和反应与欧美人不同，对善和恶的感觉也未必一致。”^②

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堪称论析日本人“行为和思想习性”的代表作。作者在第三章“各守本分”中，认为最终规定日本人行为及思想习性的是等级制度，“要想理解日本人，首先就必须明了他们是如何理解‘各守本分’的含义的。他们相信秩序和等级制度，我们信仰自由和平等，各执一端，因此对我们来说，很难恰如其分地把等级制度作为一种可能的社会结构来理解。日本人对人际关系以及人与国家的关系所抱的整个观念都是建立在对等级的信赖之上的。”^③第五章“对往昔和社会欠着恩情债的人”、第六章“报恩万分之一”、第七章“没有比义理更难堪的”，以恩和报恩作为了解日本社会结构的钥匙，指出每个人都受着皇恩、亲恩、主恩和师恩，“忠”和“孝”都是对“恩”所作的一种无限的报答义务，日本统治与服从的关系正是由报恩义务构成的。报恩的义务是无限的义务，而从义务的这种无限性中产生了人身的服从关系。作者还认为：“如果不考虑到‘义理’，就不可能理解日本人的行动。没有一个日本人在谈论行为动机、良好名誉或男男女女在其本国所遇到的两难境地时，会不经

① 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页、第2页、第10页。

② 沃尔夫，《日本经济飞跃的秘诀》，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16页。

③ 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7页。

常谈及‘义理’。”^①

《菊花与刀》展现了作者令人惊叹的学术水平和学识功力，以大量事实为依据，对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模式作了栩栩如生的描绘。本尼迪克特虽然从未到过日本，却能够对日本人独特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想习性等进行深入研究；作者虽是受军方对付日本人之需要而研究日本，却不为军方旨意所囿，而是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和研究方式展开工作，从而取得了学术界普遍首肯的成果。

拙著《日本：刀刃上的文化——武士与武士道》选择与《菊花与刀》不同的角度，即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特别是最核心、最底层的文化之一——道德，考察日本人特有的“行为和思想习性”是怎样形成的，形成日本人“行为和思想习性”的制约因素是什么。

刀刃上的文化 文化是历史创造的积淀和历史联系的纽带，是形成人们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制约因素。所以，笔者在日本文化中寻觅形成日本人“行为和思想习性”的制约因素，特别是从日本人独有的、其他民族没有的或少有的文化中寻找。因为最能代表日本民族、日本文化的特异之处，正是日本文化中起支配作用、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核心，正是导致日本人怪异“行为和思想习性”的制约因素。举个不很恰当的比喻，正像人类基因研究人员的发现：地球上的每个人与其他人有 99.99% 的基因密码相同，^② 导致人与人之间差异的，并非 99.99% 相同的基因密码，而是 0.01% 不同的基因密码。

最能代表日本文化遗产中最具持久性的价值，最能代表日本民族、日本文化的特异之处，日本文化特有的、其他民族没有或少有的文化，就是日本人在封建时代以三尺刀锋创造的刀刃上的文化——武士与武士道。对现代日本人影响最大的，是武士与武士道；最能代表大和民族持久价值而又独立不群的文化，是武士与武士道；形成日

① 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第 113 页。

② 张小军《“生命天书”掀开一角》，载 2001 年 2 月 14 日《北京日报》。

本人冷漠、自私、野蛮、好战和奉献精神、使命感、责任感、恪守职责等民族性格的制约因素，是武士与武士道；形成日本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是武士与武士道；构成所谓“日本民族精神”基础的，还是武士与武士道精神。

因此，笔者选择日本人刀刃上的文化——武士与武士道，作为考察形成日本人特异“行为和思想习性”的钥匙。

武士出现于 8、9 世纪，是武力社会的产物，武力夺取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杀伐征战，是武士产生和发展壮大的土壤与催化剂；反过来，武士的产生与发展壮大，又使争夺土地资源与政治权力的战事更加频繁，规模不断升级。10 世纪，武士迅速崛起，并在 12 世纪依靠刀剑战胜天皇朝廷的贵族政治，建立起大权在握的武家军人统治。武士崛起和武士治国的 9、10~19 世纪中叶，特别是武士治国的近 700 年间，乃是日本民族传统、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基本特征形成的时期，武士作为政治主角和时代精英，主导国家政治生活，决定社会的核心价值 and 道德取向。这样，日本人在家庭生活、职业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自然会以武士为崇拜与效法的对象，自然会在有意无意之中接受武士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

武士的利益和生存条件与农工商不同。切身利益与生存条件开始就与刀剑有着不解之缘，为刀而生，为刀而死，刀被誉为“武士之魂”。依靠“为主君奔走效劳而从中获利”，为主君奔走效劳的基本方式，就是用刀剑为主君杀伐征战，攻城掠地。他们以战争为职业，战争之事越多，其地位越高，权力越大，利益越丰。因此，武士崇尚武力，视战争如生命，以武力和战争体现人生价值。日本学者的研究也认为：“摄关政治时代的贵族尽管为了满足权势欲而玩弄一切阴谋诡计，但惟独杀人害命的勾当却绝对不干；武士则不同，他们缺乏尊重人的生命的心情，满不在乎地残害生灵，具有强烈的非人性的一面。因此，不

应该随便拔高武士的人伦道德。”^① 封建武士满不在乎地残害生灵的非人性一面，养成了日本人冷漠、自私、野蛮、好战等非人性的民族性格。

道德是最核心、最底层的文化之一，基础是利益，核心内容是调整人我己群的利益关系。武士的道德——武士道，因武士的生活状态而产生，强调对主君的绝对忠诚和献身精神，要求武士将生命看作侍奉主君的手段。幕府时代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控制，现实生活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统治体制，赋予武士道硬控制的性质，赋予武士道超法律、超契约的约束力，使武士道成了以生命效忠主君的“献身道德”。武士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来源掌握在主君手中，特别是在德川时代，经济收入由源于土地演变为源于禄米，“除俸禄外，没有其他一文一粒收入来源”，^② 离开主君的俸禄就不能生存。在武家社会，“武士最关心的大事是保家，是使其子孙昌盛，对主人效忠只不过是一种手段”。^③ 武士别无选择，只有抱定“食其禄者死其事”的人生态度，把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主君，才能达到保家和使子孙昌盛的目的，从而养成了武士彻底的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武士的“献身道德”则培养了日本人强烈的奉献精神、使命感、责任感和恪守职责、吃苦耐劳等民族性格。

武士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忠诚献身道德，目的在于保家和使其子孙昌盛。因此，“将各种封建道德联结成一个匀称的拱门的拱心石——忠义”。首先表现为主从之忠，而非君臣之忠；首先是忠于掌握自己经济命脉的直接主人，而非忠于国家；首先是对个人的义务，而不是对国家的义务。忠诚、献身和服从，完全以主君的意志为转移，具有超越政治是非的、不讲条件的愚忠与盲从的特点。

① 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88～89页。

② 本庄荣治郎：《日本社会经济史》，改造社1928年，第308页。

③ 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第90页。

渗入骨髓的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作为武士的切身利益与生存条件的反映,是日本封建制转型的必然产物,适应武家经济社会、政治体制、军事制度和思想文化等诸方面的需要而产生,在以武为本的幕府政治时代不断发展与完善。

武士道是武士用刀剑创造的道德规范,强调对主君的绝对忠诚与无私奉献,是铭刻在武士心灵深处的“圣经”,和主人驱使家臣精诚效忠的工具,也是世界上最忠实反映统治者意志的献身道德。明治以后,通过明治政府的军国主义基本国策和全民武士化政策,武士道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进一步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特别是与伦理文化融为一体,由武士的层次上升为全体日本国民的层次,由武士的精神升格为整个大和民族的精神。

1899年,日本思想家、教育家新渡户稻造博士的经典之作《武士道》,“将武士道奉为大和魂,并将它作为日本民族精神向全世界加以介绍”。^①他说:“武士道字义上意味着武士在其职业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之道,用一句话来说,即‘武士的训条’,也就是随着武士的身份而来的义务。”“它大多是一部不说、不写的法典,是一部铭刻在内心深处的律法。惟其不言不文,通过实际行动,才能看到更加强有力的功效。它既不是某一个人的头脑(不论其如何多才多艺)创造出来的,更不是基于某一个人的生平(不论其如何显赫有名)的产物,而是经过数十年、数百年的武士生活的有机发展。武士道在道德史上所占的地位,恐怕和英国宪法在政治史上所占的地位一样。”^②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的研究也认为:武士道对武士的拘束力远在一般法律之上。^③

① 万峰:《评台湾学者的武士道观》,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三期。

② 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4~15页。

③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下)》,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997页。

武士在以刀剑为主君奔走效劳的实践活动中创造的武士道，融摄了儒教、佛教和神道教，并以之为武士的世俗职责服务，为武士崇尚武勇的道德注入顽强的生命力，使武士道德升华为社会道德体系的价值核心。

9~10世纪至明治维新的千余年间，特别是绵延700载的武家社会，正是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形成的存量时代，日本社会以武士道作为社会伦理的支柱。于是，武士道便犹如绵绵细雨，逐渐向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中浸透，沉淀于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之中，形成稳定的社会心态，左右大和民族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方式，构成日本人的道德准则。新渡户稻造说：“我在少年时代所学的道德训条并不是在学校所教授的。自从我对形成我的正邪善恶的观念的各种因素开始进行分析之后，我才发现正是武士道使这些观念沁入了我的脑海。”还说：“即使具有最进步思想的日本人，如果在他的皮肤上划上一道伤痕来看的话，伤痕下就会出现一个武士的影子。”^① 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前，日本社会继续以武士道作为社会伦理的支柱。1994年，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万峰先生说：“没有文化的传统是不存在的，没有传统的文化也是不可想像的。日本武士阶级，在长达约7个世纪之久的历史涌流中，创立和发展了包括武士道在内的日本新文化——武家文化。它在以后的历史流向中又不断经过来自内外、正反两面的影响制约和批判地继承、改造而形成成为日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近年来人们开始议论武士道至今仍对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有不可忽视影响和作用的根本缘由所在。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此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② 山鹿素行以儒家朱子学说构建新武士道理论体系的著作，洋洋600多卷，其全集被公认为日本“国民道德的权威，武士精神的真谛”。武士道对日本人的影响，由此

① 新渡户稻造：《武士道》，第1版序、第104页。

② 《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

可见一斑。

武士道是倡导奉献的道德，以奉献为最高义务和最终行为，强调以生命效忠主君的献身精神，将人的潜力和奉献精神推向极限，忠实反映统治者的意志。9~10世纪至二战结束的1000多年间，在始终强调忠诚与无私奉献的政治形态下，在一以贯之的军国主义基本国策的支配下，武士道精神道德的物质化能量一直“任君驱使”。武家政治时代，武士忠诚道德的物质化能量任君支配，甘愿为主君杀伐征战、攻城掠地。明治维新后，武士道由武士的道德规范发展为全民的道德规范，全体国民忠诚道德的物质化能量也任君支配，将包括生命在内的全部忠诚都奉献给统治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双刃剑文化 武士道是日本人创造的双刃剑文化，善与恶、美与丑、光明与黑暗、天使与魔鬼并存，既存在追求幸福安宁的和平主义，又充满嗜血成性的军国主义。这两种尖锐对立的武士道遗产，在明治维新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对日本历史发展进程的促进作用，对人类文明的破坏，都是史无前例的。

当武士道向善、向美、向光明一方倾斜，服务于现代化建设时，融入民族血液之中的武士道精神，使国民对政府的建设计划表现出惊人的认同与合作态度，将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作为个人的神圣使命与责任，加快了国家建设的步伐，奠定了日本成功之路和“经济奇迹”的坚实基础。早在1884年，日本经济白皮书就宣称：“在当前政府为建立日本产业所作的努力中，应该把哪些条件列为首要的呢？可能既不是资本，也不是法律和规章，因为这两者都是死的东西，是完全无效的。使资本和法规运行起来的是精神……因此，如果就有效性来确定这三个因素的分量，则精神占十分之五，法规占十分之四，而资本只占十分之一。”^① 白皮书所说的精神，就是以武士道为核心的日本

^① 转引自弗兰克·吉布尼，《日本经济奇迹的奥秘》，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第20页。